王旭清．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城镇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家庭教育投入的视角［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4）：58-66.
WANG Xuqing. The motivation， typ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educational urbaniz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20（04）：58-66.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1.04.007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城镇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家庭教育投入的视角

王旭清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近年来，中西部普遍出现了新生代农民教育城镇化。在基础性动力、外阶层动力和内阶层动力三重动力影响下，教育普遍内化为家庭目标并最终形成了教育城镇化。作为一种家庭教育投入，农民家庭在代际合力和教育观的作用下出现了选择性投入、最大化投入、内卷式投入和低水平投入四种教育投入方式。其中，选择性和最大化投入家庭买房陪读实现教育城镇化，内卷式投入家庭租房维持，低水平投入家庭留守考学。在农民家庭的发展性需求下，应重视城乡教育资源调整，坚持建设强大公立学校，规范引导市场化教育机构，保护农民家庭的发展希望。

关键词：农民教育城镇化；家庭教育投入；家庭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1）04-0058-09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教育城镇化是指农村学生向城镇学校的转移过程[1]。目前，教育城镇化已成大趋势。1987—2014年教育城镇化水平由21.7%上升到72.55%，2010—2014年乡村学生数断层式下降，教育城镇化率暴增，平均增长率达到8.4%[1]。研究发现，近八成的农村家庭希望子女就读于城镇学校，且中部和西部家庭的这种需求更强烈[2]。在此过程中，县城成为关键区域[3]，农民家庭普遍通过在城镇购房入户，或者以陪读、寄宿、走读、寄养、寄管、随读等[4]方式实现教育进城。现实表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学生和农民家庭会大量进入县城，这势必对县域社会、城乡关系以及教育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值得在实践和学术层面持续关注。

目前，农民教育城镇化研究形成了家庭策略、阶层和性别三种视角。首先，家庭策略视角集中在陪读研究中，着重关注家庭资源的传递与调配，意在反映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秩序和弹性。比如，王欣、卢春天将陪读作为阶层、资源整合、生活消费提升和教育期望下的家庭资源传递渠道[5]。苏运勋指出隔代陪读是农民家庭教育策略的内在优势[6]，并且按照主体和空间将陪读划分成四种类型，充分呈现出农民家庭策略的灵活性[7]。

其次，阶层视角主要从阶层分化和竞争的角度理解教育城镇化，重在回应农民如何适应并进入城市阶层体系的问题。比如，雷望红认为陪读是农民家庭在阶层流动压力下进行的一种风险投资[8]。朱战辉将进城购房陪读看做是中间阶层通过教育竞争完成城市化的内在动力[9]。周娟则将农民教育进城解读为阶层分化和村庄竞争压力下，农民完成脱离农村的惊险一跃，“实现‘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的表现[10]。

最后，性别视角主要关注进城陪读母亲，重在解释年轻女性陪读的家庭合理性及其社会意义。比如，吴惠芳、田北海等学者认为，母亲陪读虽然合理，却不利于女性个人发展[11-12]。冯小则指出陪读表面上看是为了教育，本质上是性别

收稿日期：2021-01-23 **修回日期：**2021-02-08
作者简介：王旭清，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E-mail：wxq20190628@163.com

结构失衡背景下妇女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13]。

上述视角分别从家庭资源配置、家庭发展压力和教育主体的角度扩展了教育城镇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仍有可推进的空间。首先，研究对象相对单一。作为典型现象的进城陪读只是农民教育城镇化的一种表现，不能代表全部，也无法体现整体趋势。其次，大都将教育作为前提，缺少从农民经验实践的角度对教育如何内化到家庭并最终形成城镇化趋势的动力分析。最后，对教育城镇化差异性的关注和解释不足。

事实上，教育城镇化是不同农民家庭形成相似教育投入决策后出现的整体性结果。教育城镇化问题其实也是农民教育投入问题。黄祖军认为农民受到理性和实践双重逻辑的影响，教育投入行为有着显著的差异性和变化性[14]。虽然概括了三种类型并归纳出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两种倾向，但是个体与结构之间模糊的互构关系使得分析对不同类型的解释力仍显不足。

综上，教育城镇化作为中西部的普遍现象，涉及整个农民群体及其家庭决策变迁，反映出农民教育投入的集体转型。对此，笔者以村庄为单位，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各阶层群体，从具体经验出发来着重分析教育城镇化的动力、类型和策略，即分析教育如何内化为农民家庭目标并引发了教育投入决策的集体变化，理解其内在差异。

笔者认为，在家庭内生基础性动力、外阶层动力和内阶层动力三重动力影响下，教育才转化成家庭目标并助推了教育城镇化。能力和意愿是影响农民教育投入的关键变量。其中，能力在“新三代家庭[15]”结构下主要指代际合力，意愿具体指农民的教育观，两相作用形成了选择性投入、最大化投入、内卷式投入和低水平投入四种投入方式。据此可将教育城镇化划分为买房陪读、租房维持和留守考学三种类型，分别内涵不同的家庭策略。

二、教育城镇化的现状与变迁

广义上，教育城镇化是指农村学生向城镇学校的迁移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在学龄前、义务教育阶段或者高等教育阶段通过各种方式完成。狭义上，教育城镇化是指最近十年来，大量农村学生在学龄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向城镇学校聚集的过程。

从经验上看，过去中西部农民教育城镇化大都从高等教育阶段开始，以学生考试进入城镇高中为具体表现。最近十年，这一进程明显提前，小升初和幼升小成为两个明显节点。本研究以对豫中Z村为期20天的经验调研为基础，来呈现中西部农民教育城镇化的具体状态。

（一）村庄概况与农民家计

Z村位于河南中部，属于典型的传统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全村823人，231户，由六个小组、两个自然村构成，人均土地0.0553～0.08公顷，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地逐渐形成了夫妻分工半工半耕模式。其中，男性分三季外出务工，收麦、种麦、过年时返乡，平均每季在外务工60～80天，以建筑业为主。女性大都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种菜养猪，维持村庄人情往来。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当地开始出现代际分工半工半耕，夫妻同时外出现象增多。其中，新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很快形成了代际分工，而子女未婚的第一代农民工家庭则出现了两代人一同外出务工的现象。最近三五年，当地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土地流转现象增多，出现了承包0.67～1.33公顷土地的中农。这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性普遍降低，外出务工时间增长，且长期外出务工家庭增多。即便如此，当地农民整体上三季外出的节奏并没有被打乱，不论是夫妻分工还是代际分工，大部分家庭仍然保持了季节性返乡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

（二）教育城镇化现状与变迁

为呈现农民教育城镇化的整体状态，笔者在Z村两个自然村共抽取了52户家庭进行统计，获得了62个年龄在0～18岁之间且户籍在村的学生样本，其目前的就学状况如表1所示。

总体上看，虽然Z村大部分孩子仍然在乡村学校就读，但教育城镇化正在从考学进城向转学进城转变，并且近年来明显加速。

具体来说，虽然大部分孩子学前仍然在乡村，只有3个孩子随父母迁往外省打工地，但义务教育阶段的转学比例相比过去明显上升。从数据上看，高中教育阶段的孩子中有62.5%通过考试进入县城高中，他们的义务教育均在乡村完

表1 Z村抽样学生就学概况表

就读学校 就学阶段	高中	初中	小学	学前	总计	备注
乡村学校		5	14	18	37	计划进城的共15个
县城学校	6	5	4		15	
市区学校	2	1	1		4	
省外学校		3		3	6	
总计	8	14	19	21	62	
说明	1. 在县城和市区就读高中的学生中，从小转学进县城的1人，从义务教育阶段转学进城的有2人，通过中招考试进城的有5人 2. 初中阶段在非乡村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小升初考试进城的1人，小学转学的有8人 3. 在所有县城就读学生中，有4人正在或者曾在私立学校就读					

成。而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乡村就读的孩子占比为57.5%，在县市就读的占比33.3%。

如果将计划进城的孩子计算进来，便能清楚地看到未来几年内的变化趋势。据统计，在目前留在乡村就读的37个孩子中，近期计划进城就读的孩子全部集中在小学和学前阶段，共15个。其中，家庭近两年内买房且准备进城的共11个，学前阶段7个，小学阶段4个；家庭未买房但明确表示准备买房、租房或送私立学校进城的共4个，学前阶段2个，小学阶段2个。也就是说，三五年之内将有至少15个孩子进入县城，届时同批统计内的学生进城就读比例将达到46%。

另外，村民对进城上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十年间，从望而不及、集体排斥变成了集体追随。

具体来说，2010年，Z村出现了第一个买房将孩子转学进城的家庭，该家庭后来举家搬迁，由母亲在县城照顾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和读小学的儿子。在村民眼中，他们是当时的上等户，也是极少数有实力将孩子转学进城的家庭。

2014年，Z村出现了第一个将孩子送进县城私立学校的家庭。当时，该家庭的女儿正在上六年级，儿子上二年级。这一举动引起了村民的热议。孩子母亲在访谈中提到，当时她顶着很大的压力，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比如“是金子在哪都发光”，“家家都在村里上，就你家上不了”，“女孩子学出来又能怎么样，出了门还是别人家的人”等等。

最近两三年，进城上学成为大家争相追赶的“形势”，有条件的家庭纷纷计划买房进城。村庄中随即出现了“村里学校不如县城”、“县城学校教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有条件谁不想送孩子进城”等新言论。尽管仍然有人保持着传统教育观念并为孩子留在乡村上学辩护，但无法扭转大家普遍认为城里教育好的大趋势。

三、教育城镇化的动力及家庭转化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村庄中上层家庭就开始将孩子转进县城上学，但这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教育城镇化。近年来，教育进城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选择。如何理解这种转变？

一般来说，阶层流动、村庄竞争和教育意识被认为是推动教育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事实上，这三个因素只有经过农民家庭的普遍内化才能触发集体反应。笔者认为，教育的普遍内化受基础性动力、外阶层动力和内阶层动力的影响。其中，基础性动力来自教育投入能力；外阶层动力影响着教育投入意愿；内阶层动力助推了教育城镇化。

（一）基础性动力：务工水平与经济能力

家庭经济能力是影响教育投入的基础性因素。目前，面临进城选择的主要是孩子处于中小学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整体务工水平更高，经济能力更强，为教育进城提供了基础性动力。

首先，以样本家庭为例，高中阶段学生的父母年龄大都在40～50岁，这类家庭以夫妻分工半工半耕为主，家庭年收入5～8万元。中小学阶段学生的父母年龄大都在30～45岁，这类家庭以代际分工为主，近年来出现了新的分工形态，即中老年夫妻在本地半工半耕，年轻男性外出务工，年轻女性在本地“半工伴读”[16]，年收入8～10万元。学龄前阶段学生的父母年龄大都在30岁以下，这类家庭代际结构年轻，可以实现两名男性外出务工，家庭年收入可达到10～12万元。

其次，只要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就具备教育进城的实力。三个典型家庭案例如表2所示。

其中，案例1属于高投入型家庭，教育占家庭总开支高达37%。案例2是从普通代际分工转型而来的新分工家庭。案例3虽然属于负担型家

表2 典型家庭案例表

案例	教育选择	农民家计、收入与支出
1	私立学校	高某，39岁，女儿在公立学校读高二，儿子在私立学校上七年级。高某夫妇过去经营电动车店铺，两年前丈夫外出务工，今年将店铺关闭。受疫情影响，丈夫工资从过去的每月6～7千元降到了3千多元，高某在村任妇女主任。另外，他们种地0.73公顷。高某的公婆70岁，公公还在经营打井生意。 今年高某预计其家庭总开支在8万元左右。其中，教育开支3万元左右（其中儿子学费9000元，女儿租房7000元，补习班费用3650元），保险开支8千元左右，农业生产性开支3千元左右，基本生活开支2.5万元左右。
2	进城陪读	朱某，41岁，儿子在公立小学读五年级，女儿今年刚考上大学。朱某之前与丈夫在广州打工，女儿上一年级时返乡，生下儿子后没有再外出。等儿子上幼儿园，她带着两个孩子进城，将女儿送入县城公立中学，自己半工伴读。朱某的公婆70多岁，以务农为主，打零工。 孩子转学时，朱某和丈夫用多年务工积蓄在县城买房，15万元左右。现在，朱某每月工资1～2千元不等，丈夫工资6～7千元。女儿在家期间，三人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每月2千元左右。儿子上各类补习班的费用每年2千元。
3	租房陪读	袁某，40岁，大儿子九年级，二儿子五年级，都在公立学校。袁某过去和丈夫在广东打工。五年前，她返乡将两个儿子带进县城，自己在学校食堂打工，月工资1～2千元。丈夫现在在浙江打工，工资7～8千元。袁某的公婆70多岁，婆婆肺癌。娘家父母一直多病，近几年已经花费将近50万元，现送入养老院，娘家姐妹均摊费用。目前，母子三人在县城每月房租400元，生活开支控制在2千元以内，大儿子补习每年花费2千元。

庭，但还是可以支持两个儿子进城就读。也就是说，在农民家庭结构和家庭收入总体比较均质的情况下，其实大多数家庭都具备教育进城的潜力，差别只在于投入选择和进城方式。

（二）外阶层动力：底层认识与教育责任

家庭经济能力决定教育投入能力，而教育投入意愿最终决定了投入行为。作为在城乡之间很难稳定下来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有着明确的底层认知，更能感受到外阶层压力，希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超越自己实现阶层流动，也更愿意加大教育投入。

首先，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的阶层定位和家庭实践。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村庄认同和归属上明显淡化，更深的嵌入到了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体系中，对自己的底层位置有了更强的社会性认知。

以往研究通常认为，在“双轨分层”[17]体系下，农民群体生活在城市主导的外阶层和村庄为主导的内阶层双重社会系统中。农民虽然客观上属于外阶层中的底层，但由于嵌入在村庄内阶层，他们并不认同外阶层的底层定位，而是在村庄内阶层寻找自己的位置，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人生任务。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是“双重脱嵌”[18]的一代，身份意识模糊、城市化意愿强烈，徘徊在城乡之间难以扎根[19]，很难再像第一代农民那样对城市脱敏，被村庄保护。

具体而言，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过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教育，从小就在村庄中习得和共享了城市文明观念，对城市有着本然的认同和向往。另一方面，他们目睹并亲历了打工潮，在不稳定的打工生涯中积累起劳动和社会经验，能敏锐地感知到知识、文化、学历对个人就业、收入、能力、保障、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上例中的袁某十多岁就外出打工，当过小管理。她清楚地看到，比起在流水线工人，管理人员相对轻松而且工资翻倍，如果再往上走还可以坐办公室，工资高环境好又不用下力。但她明白，再往上必须要有学历。

其次，新生代农民的底层认知会转化成对文化和知识的重视，通过承担教育责任在家庭中完成这一经验的代际传递，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对孩子学业的重视，比如挑选学校及师资，给孩子报辅导班，对成绩的严格要求，仔细检查并辅导家庭作业，无时无刻不对孩子灌输学习的重要性等等。

今年28岁的胡某，和丈夫都是不到二十岁就外出打工。有了大女儿后，他们送她上早教、上最好的幼儿园，给她报兴趣班，买益智的玩具和补品等等，每晚的作业也会一道一道题仔细检查。胡某说：“我们俩当时都没好好学习，现在

就想让孩子好好学，尽我俩最大的能力吧。”而今年38岁的李某，丈夫在外地务工，属于重体力劳动，自己在县城做计件工。她时常跟儿子讲：“你看你爸辛不辛苦？你要好好学习，考上高中，上个好大学，这样就不用像我和你爸这样。”上例中的袁某每次都给两个儿子定标准，差几分就要挨几下板子，两个儿子现在都非常刻苦。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在认识程度、投入程度和教育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特点。他们普遍对脑力和体力劳动、稳定和不稳定的生活、正规和非正规的职业等这些具有阶层属性的差别有着直观的认识和经验，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学，有份稳定的工作”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三）内阶层动力：低度分化与教育竞争

中西部熟人社会中的低度分化往往会塑造强烈的村庄竞争氛围[20]，使教育投入从家庭决策变成一种社会性标志，成为家庭能力和村庄地位的象征，进而将大多数农民家庭裹挟进来，助推教育城镇化的形成。

首先，低度经济分化仍是中西部农村的常态。从Z村的经验来看，除去少量的离村家庭和贫弱家庭，大部分家庭都属于中间阶层。按照家庭代际结构和劳动力务工情况可细化为三种类型。其中，中上阶层家庭的代际结构优势最强，父辈45～55岁，子代20～30岁，两代人都还比较年轻，均能外出务工，家庭收入较高。中间阶层家庭的代际结构优势次之，父辈60岁左右，子代30～40岁，中老年人在本地以务农为主半工半耕，家庭收入主要靠两个年轻人。中下阶层家庭的代际结构相对劣势，父辈70岁左右，大都在村务农，家庭收入主要靠中年男性。尽管务工水平存在差异，但综合家庭积累和家庭生命阶段来看，中间群体的经济分化并不大。

其次，低度分化的中西部村庄很容易形成教育竞争，助推教育城镇化风气的形成。一般来说，向上流动意愿强的家庭会率先开始加大教育投入，主动追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比如案例1中的高某说：“乡村学校条件不好，关键是老师不行，孩子犯一点小错就让家长领回家，还怪家长没教好。私立学校有纪律老师，每天在群里发孩子的状态，明显更负责任。”案例2中的朱某则表示：“乡村学校也可以，关键是氛围不一样，县城学校抓得严，学生都知道学习，孩子肯定受影响。”

这些进城家庭会形成示范，并且传递县城教育的相关信息，很快就会形成带动效应。在中间阶层经济实力非常均质的情况下，有的家庭会出于竞争心理而投入教育，典型表现在“别人家都送进县城，我们为什么不能”；有的家庭则会因为看到别人家孩子的进步而受到触动，由此开始加大投入。等到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开始行动，教育进城就成了被默认的“形势”，不论是否合理，能追赶上就已经象征了家庭能力。由此，教育进城也就被赋予了村内阶层竞争的社会性内涵，即使是能力和教育意愿都比较弱的家庭，也会被裹挟进来，产生心理压力。比如今年42岁的张某，儿子在村小上三年级，面对大家都计划送孩子进城的形势，他显得不理解又有些羡慕，“我觉得村里学校就可以啊，小孩脑子笨到哪都学不好。他们都说城里好城里好，还是有钱”。

四、教育城镇化的类型与策略

对中西部普通农民家庭而言，代际合力和教育观是影响教育投入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教育投入逻辑下，农民教育城镇化出现了买房陪读、租房维持和留守考学三种类型，分别内涵着不同的家庭策略安排。

（一）代际合力、教育观与农民教育投入

已有研究指出，家庭经济能力和教育投入意愿是影响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的关键因素[21]。受限于分析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虽然学者们找出了很多变量，比如家庭收入、家庭务工水平、劳动力素质、父辈职业、父辈受教育水平、农户分化、性别、文化等等[22-25]，但很难将变量组织起来找到内在关联。从经验上看，农民教育投入的逻辑并不复杂，代际合力和教育观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动。

首先，农民家庭的经济能力和代际合力直接相关。在“新三代家庭结构”下，两代人为了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整合起来已经是中西部普通农民家庭的常态，两代人的整合程度基本上就决定了家庭发展能力。在子代普遍外出务工的情况下，代际支持的力度和程度显得尤其重要。张雪

霖把代际责任具体操作为教育、婚姻和隔代抚养，对比总结并解释了不同地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性状况[26]。其实，同一地域的父辈责任大体相同，差别主要在于承担责任的能力。在中西部农民人力和关系资本都高度均质的情况下，父辈劳动能力就是最重要的变量。一般来说，父辈年轻的家庭代际合力更强，可以获得两到三人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总体经济能力比较强；父辈年迈的家庭代际合力弱，只能获得一人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总体经济能力比较弱。

其次，农民的教育投入意愿和教育观念直接相关。如果农民能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那么进行投入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而是否重视实际上取决于对教育所能获得的长期收益的认识。由于在认识水平、利弊权衡、生活选择上存在个体性差异，不同家庭对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同，但总体上可以从教育目标、学习归因、投入方式和管教方法上将教育观念分为养大和培养两种。总结如表3所示。

表3　农民教育观念表

教育观念	教育目标	学业归因	投入方式	管教方法
养大	成人	天赋	成本最低化	顺其自然
培养	成才	培养	资源最优化	用心精细

具体而言，在养大式教育观中，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知识和成就，而是能养活自己。教育不是父母的责任，而是学校的职责。投入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才最符合家庭再生产要求，顺其自然才是管教的常态。在这种观念下，很多农民认为上学并不必要，因为孩子长大“只要有两双手就不怕吃不饱”。对他们来说，上学是孩子的事，和父母的关系不大，能不能学出来也主要靠孩子自己。由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下意识的在学业上要求过孩子，更没有特别投入过，所以一般都会将孩子学习好归因为天赋高。

培养式教育观则认为，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让人能够生存，而是使人成才，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尽管天资有差别，但不同的孩子只有大才和小才的差别，没有天才和废物的区分，即使天赋异禀，不加培养也只会泯然众人。因此，能否成才关键靠培养，而培养就要投入。于是，持有这类观念的农民更倾向于加大并优化教育投入，包括资源、人力和心力。他们普遍认为投入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因而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受教育条件，密切注意孩子的学业和身心状况，尽可能用心精细地管教孩子。

综上，可将家庭教育投入划分为四种类型。

表4　农民家庭教育投入的类型

教育观念 代际合力	强	弱
养大	选择性	低水平
培养	最大化	内卷式

首先，选择性投入追求低投入高回报，量力而行，择优培养。这类家庭教育投入比较理性，不会无条件向教育倾斜资源，投入多少和投入方式主要取决于孩子的学业表现，追求“物尽其用”，尽量节省人力和心力，将重点始终放在家庭积累上。

其次，最大化投入不计成本，尽力而为，一切以孩子为重。这类家庭更重视培养，不求“物尽其用”，但求问心无愧，情愿尽最大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只要有利于孩子成长和学习都愿意尝试。

然后，内卷式投入与最大化投入的逻辑相似，但是家庭经济能力偏弱，投入教育对家庭积累的损失较大，风险也更大。换句话说，这类家庭是通过透支家庭积累能力来投入教育。

最后，低水平投入遵循教育成本最小化，优先家庭再生产的逻辑，对孩子不图培养，但求长大。这类家庭一方面没有能力进行教育投入，另一方面也没有意愿投入，越是如此就越容易陷入低水平循环。

（二）教育城镇化的类型与策略

一般来说，教育城镇化需要家庭在住房、生活、学校和孩子学业四方面进行选择和投入，涉及家庭资源和人力配置问题。不同的农民家庭教育投入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教育城镇化类型及家庭策略安排。

首先，选择性投入家庭和最大化投入家庭大都形成了买房陪读模式。这两种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策略的重点在于进城的时间、方式和分工安排。其中，选择性投入家庭倾向于隔代进城陪读，延长家庭积累时间，只在孩子成长关键期

优化家庭分工；最大化投入家庭倾向于母亲陪读，提前进城，尽快形成最有利于教育的家庭分工。

分别来看，选择性投入家庭一般会选择孩子小学三年级到七年级进城。这段时间，孩子成长迅速，行为、性格和学业表现都会出现明显变化，而且知识难度太高，有利于家长判断孩子的可塑性。另外，这类家庭更倾向于进城买房，选择公立学校，并优先考虑让奶奶进城陪读，等孩子进入青春期或者升学阶段，再由年轻女性陪读以表重视。如果孩子学业下降或者“管不住”，家庭便会维持最低限度投入，甚至将孩子转回乡村学校。比如今年37岁的张某，三年前从打工地返乡，买房进城陪读。她说：“儿子从小成绩就可以，看着他还不错就想着能培养一下，所以才回来。”而今年43岁的白某原本已将儿子送进县城，但因为儿子太调皮管不住，去年又把孩子转回乡村小学。在学业投入上，这类家庭只有在孩子成长关键期才会由母亲监管并且参与课外补习，平常比较灵活，一般由奶奶监管不参与补习，但也可能由于祖辈忙于兼职、能力不足或图省事等原因而参与补习。

总之，这类家庭会在教育和进城之间寻找发展平衡，尽量兼顾，在灵活调整中稳健投入。因此，即使条件允许他们也不会选择私立学校，而是优先买房。即使家庭能够支撑母亲返乡陪读，他们也会优先让奶奶陪读，延长年轻女性的务工时间。

最大化投入家庭进城更早、起点更高、学业投入更多，因此，他们大都在孩子幼儿园甚至出生后不久就搬进城市生活。在培养式教育观下，这类家庭的母亲大都非常重视亲子关系、陪伴教育，不会因为家庭压力增大而轻易离开孩子，而是选择将婆婆拉入县城负责日常照料，自己白天工作晚上回家管孩子。在学业投入上，他们积极参与、重视质量，一方面母亲会用心辅导，另一方面会择优选择教育资源，比如挑选中间偏上档次的奶粉、营养品、早教、学校、补习班等。上文中的胡某婚后就一直在县城生活，今年生下小女儿的她感到现在带孩子和当年带大女儿完全不同，于是开始积极学习各种育婴知识和方法，投入补品和早教。胡某打算等小女儿再长大一些自己就在县城找份工作，白天把孩子交给婆婆，晚上回来自己管。

总之，这类家庭一切以孩子为重，会尽早将家庭调整为最有利于孩子成长学习的状态，在资源、人力和精力上都进行最大化配置。因此，他们优先让母亲陪读，由奶奶帮忙照顾，格外重视课外投入。有的家庭甚至出于校园环境、学校管理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的考虑会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但由于负担较重，这类家庭比较少。

内卷式投入家庭大都选择租房维持。这类家庭代际合力弱，难以兼顾积累和教育，家庭策略的重点在于优化资源和劳动力配置。

具体说来，这类家庭虽然经济条件一般，但由于重视教育，往往会选择内卷一个家庭主要劳动力来支撑教育进城。受经济条件限制，他们买房困难，大都在公立学校周边租房生活。从家庭分工来看，年轻女性一般会在县城兼职时间灵活的工作，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由年轻男性长期外出务工。在学业投入上，这类家庭的母亲格外用心，会在成绩、家庭作业、学习习惯等方面对孩子进行综合监管，只有在学业辅导超出自己能力之外或者孩子学习吃力的状况下才会投入补习。比如高某，放弃了在外务工高达每月8千元的工作返乡照顾孩子。对两个儿子，她“软硬兼施”奖罚分明，既会严厉管教，也会写信沟通，知道儿子打游戏或者偷懒也懂得适当宽容，事不过三下不为例。不仅如此，她还以身作则，只要孩子在家写作业就坚决不碰手机不看电视。今年大儿子上九年级，给他报了补习班。小儿子五年级，成绩一直不错，暂时还不需要补习。

总之，这类家庭即使条件困难也会尽力投入孩子教育，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人力和精力上的内卷化投入来实现教育城镇化。

最后，传统型投入的家庭主要靠孩子考学来完成教育城镇化。这类家庭没有投入教育的能力和意愿，大都由祖辈在乡村照顾孩子，很少参与课外补习，家庭监管也顺其自然，教育城镇化主要靠孩子升学考试完成。除了少数贫弱家庭，其他此类型的家庭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投入，而是没有意愿，他们坚持认为学习主要靠天分。比如上文中的张某，他长年在外从事建筑业，今年刚买了车，谈到孩子教育时说：“我儿子跟我一样，

脑子笨，学不会，他现在什么都不懂，送到城里也没用，哪儿上都一样。”

从长期来看，农民家庭的教育城镇化模式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家庭生命阶段、家庭经济能力以及教育观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比如，买房陪读型可能因为家庭意外退回留守考学型；而留守考学型可能因为教育观改变转而加大投入等等。不论如何变化，越来越多家庭放弃低水平教育投入，向选择性、最大化、内卷式转变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丰富多元而不失灵活的家庭策略安排也是必然。

综上，可整理农民教育投入、教育城镇化策略及类型表，如表5所示。

表5 农民教育投入、教育城镇化策略及类型

教育投入	住房	生活	学校	学业		教育城镇化
				家长监管	课外补习	
选择性	买房	母亲或奶奶照顾	县城公立学校	不一定	不一定	买房陪读型
最大化	买房	母亲和奶奶共同照顾	县城公立或私立学校	母亲	参与	
内卷式	租房	母亲照顾	县城公立学校	母亲	不一定	租房维持型
低水平	在村	祖辈照顾	乡村公立学校	顺其自然	不参与	留守考学型

五、发展性压力：农民教育城镇化反思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普遍出现的教育城镇化，是农民家庭开始集体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典型表现。这反映出现阶段农民家庭的主要压力仍然是发展性压力。不同于之前发展的主要内涵是超越温饱的小康生活水平，现在农民家庭的发展包括了对下一代向上流动的预期，即普遍希望下一代可以超越自己，实现学历、职业、生活上的体面与稳定。

在这种发展性压力下，农民进城追求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是必然趋势。从积极的一面看，教育城镇化象征着农民家庭有着高度活力和发展希望，县域城镇化还有很多可能，中西部地区仍然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从消极的一面看，过快的教育城镇化会造成农民家庭负担加重，导致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县域发展、公共配套、公共治理等问题，在政策上面临很多挑战。

总体来看，在城乡二元保护性结构下，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从容灵活地往返，整体上都很有安全感。但在发展性压力下，他们未必有满足感、获得感和成就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农民来说，这一矛盾典型表现在对城市化生活、优质公共服务、子代教育以及完整家庭生活的追求上，而县城逐渐成为满足农民这些发展性需求的重要场所。因此，应重视城乡教育资源调整，坚持建设强大公立学校，规范引导市场化教育机构，保护农民家庭的发展希望。

参 考 文 献

[1] 吴磊，焦华富，叶雷，等. 中国省际教育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2018（1）：58-66.
[2] 叶庆娜. 农村家庭义务教育的区位选择[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3）：104-113.
[3] 范先佐. 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义务教育发展问题与策略——基于4个省(自治区)部分县市的调研[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39-146.
[4] 庞晓鹏，龙文进，董晓媛，等. 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J]. 中国农村观察，2017（1）：97-112＋143.
[5] 王欣，卢春天. 农村陪读家庭资源传递及其影响——基于“陪读”的个案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9（8）：69-75＋41.
[6] 苏运勋. 隔代陪读：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与家庭秩序[J]. 北京社会科学，2019（9）：66-75.
[7] 苏运勋.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村陪读:以豫南S村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2020（5）：69-75.
[8] 雷望红. 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J]. 中国青年研究，2018（12）：86-92.
[9] 朱战辉.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69-77.
[10] 周娟，舒丽瑰. 阶层分化、村庄竞争与“拟态进阶”

——农民进城定居的村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29-37.
[11] 吴惠芳，吴云蕊，陈健. 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J]. 妇女研究论丛，2019（4）：28-38.
[12] 田北海，黄政. 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2）：99-106.
[13] 冯小. 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17（12）：60-66.
[14] 黄祖军. 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研究[D]. 上海：上海大学，2010.
[15] 杨华，王会. 中国农村新“三代家庭”研究[J]. 中国乡村研究，2020（1）：128-161.
[16] 蒋宇阳. 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J]. 城市规划，2020，44（1）：35-43+71.
[17] 魏程琳. 双轨分层与中国的弹性社会结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39-47+155.
[18] 朱妍，李煜. “双重脱嵌”：农民工代际分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社会科学，2013（11）：66-75.
[19] 何绍辉. 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J]. 青年研究，2008（11）：9-14.
[20] 杨华. 中国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研究[J]. 经济学家，2017（5）：26-35.
[21] 罗谦. 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的分析逻辑——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视角[J]. 现代教育科学，2019（4）：1-5+10.
[22] 李旻，赵连阁，谭洪波.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2006（5）：73-78.
[23] 闫新华，杭斌.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地位关注的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9（5）：1-13.
[24] 龙斧，梁晓青. 代际消费不平等：阶层化视角下子女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J]. 南方人口，2019，34（4）：26-36.
[25] 周春芳，苏群，王翌秋. 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异质性研究——兼论影子教育对教育结果均等化的影响[J]. 教育与经济，2017（2）：62-68.
[26] 张雪霖.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6）：43-52.

The motivation， typ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educational urbaniz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WANG Xuqing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China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education urbanization has generally appear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powers of basic motivation，outer class motivation and inner class motivation，education has generally been internalized as family goals and finally formed the urbanization of education. As a kind of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force and education concept，four education investment modes of selective investment，maximization investment，involution investment and low-level investment have appeared in farmers′ famil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mong them，families with the selective and maximization investment achieve the urbanization of education by purchasing houses in cities and accompanying their children，the families with involution investment maintain their life by renting houses in cities，and families with low-level investment stay where they were and struggle for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peasant families，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djust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al resources，the instruction of strong public schools，the standardized guidance of market-oriente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and the protection of peasant families′ hope of development.

Keywords：The urbanization of farmer education；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Family strategy

（编辑：程俐萍）